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

雪峰年谱

包子衍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

雪 峰 年 谱

包 子 衍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福康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

雪 峰 年 谱

包子衍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插页1 字数 178,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书号：10078·8657 定价：1.70元



冯雪峰像



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1931年摄于上海)



冯雪峰全家合影(解放初摄于上海)

目 录

传 略	1
年 谱	12
附录一：雪峰笔名、化名等	241
附录二：雪峰回忆资料编目	247
后 记	252

传 略

我们战斗着，象鲁迅先生似的韧战下去，终能达到我们所战斗的目的。

——冯雪峰：《鲁迅论》

冯雪峰(1903—1976)，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诗人、作家、翻译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浙江省义乌县人。原名福春，改名雪峰，笔名画室、洛扬、成文英、文英、何丹仁、丹仁、O.V.、吕克玉等。

他出身农家，从小参加劳动，养成了坚韧、勤奋、质朴、豪犷的气质。1918年在县立高小毕业；第二年考入金华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21年春，因带领同学反对学校专制而被开除学籍；同年秋，转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久，就参加了该校的文学团体晨光社，开始写作新诗。1922年春，与同学潘漠华、汪静之及在上海的诗友应修人以“湖畔诗社”名义，出版诗集《湖畔》。翌年年底，编印诗集《春的歌集》。后魏金枝、谢澹如、楼适夷等也参加进来，刊行过四期《支那二月》，雪峰为这个月刊写了新诗和散文。

1925年春，雪峰到北京大学旁听并自学日语，其间曾多次听过鲁迅讲课。学习之余，从事校对、家庭教师、故宫博物院雇员等工作以维持生活。1926年起，从日文翻译诗歌、散文、小

说,特别是有关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苏联文艺状况的论著。除散见于期刊者外,这时翻译出版的有《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俄的戏剧与跳舞》、《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等。1927年6月,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李大钊惨遭杀害的白色恐怖形势下,雪峰继承先烈遗志,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北京党组织被破坏,他也被官厅追缉,遂于1928年初南下。他在上海一面寻找党组织,一面从事翻译《我们的一团与他》(小说)、《妄想》(小说集)、《新俄的文艺政策》、《枳花集》(论文集)、《流冰》(诗集)等书稿。5月,针对当时创造社等对待鲁迅的错误态度,写《革命与知识阶级》,为正在受到围攻的鲁迅辩护。7月,与浙江省党组织接上关系,回义乌担任中共城区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义乌县立初级中学国文教员。他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组织进步团体“试鸣社”,发动商民为反对增加屠宰税举行罢市等。11月,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离开义乌到上海。经柔石介绍与鲁迅交往,从此他成为鲁迅后期斗争生活中的忠诚学生和亲密战友,成为党和鲁迅之间的诚实的联系者。

从1930年到1933年,雪峰是党在左翼文化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先后担任中共“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在三年多时间里,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如与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领导“左联”和其它左翼文化团体,主编或编辑《萌芽月刊》、《巴尔底山》、《前哨》(《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等“左联”机关刊物,编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撰写批判“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等错误观点的文章,主持“左联”、“社联”合办的“暑期补习班”与“现代学艺讲习所”,协助鲁迅举办木刻讲习会,

筹备远东反战会议等等。在他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期间，由于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更由于瞿秋白对工作的指导，“左联”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以坚强的斗争意志，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为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他在上海这段时间发表的论文有《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关于革命的反帝大众文艺的工作》、《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翻译出版的有《作家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梗概》（即列宁的《卡尔·马克思》）、《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学评论》、《现代欧洲的艺术》等。

1933年12月，雪峰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瑞金中央苏区党校教务主任、副校长，出席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在瑞金期间，他与毛泽东交往甚多，经常促膝长谈，谈话的中心是鲁迅在白区斗争的业绩。1934年10月起，参加长征。征途中担任过红九军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干部团上千队政治教员、红军大学高级班政治教员等职。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1936年4月，他受中央之命以特派员身份到上海。动身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交给他建立秘密电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并寻觅地下党组织、附带管一管文艺界工作等四项任务。张闻天还几次嘱咐他：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

雪峰遵照中央指示，首先向鲁迅介绍了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传达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根据中央政

策精神，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论争中，他以“O.V. 笔录”的形式为病中的鲁迅代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为鲁迅起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还用吕克玉的笔名写了《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10月上旬，代鲁迅以火腿一只、《海上述林》（上卷）两册，并自购围巾、听装白锡包香烟等物由交通携往陕北，赠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鲁迅逝世后，他代表中共中央主持治丧工作。

雪峰到达上海后，还很快地与沈钧儒等抗日救亡运动领袖、茅盾等作家以及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久，又建立秘密电台，沟通了上海和陕北的联系。革命先烈方志敏牺牲前在监狱里托人带给鲁迅转交党中央的信和《可爱的中国》等文稿，也是他根据中央的意见派交通将信送到中央，将文稿珍藏在上海。解放后，这些文稿由他主持出版。

雪峰得知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流落在上海，设法找到了他们，并托人带往法国转送苏联入学深造。

雪峰到达上海后，还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过，史沫特莱据此写了报道，发向世界，各国人民第一次得到了有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正确而系统的消息。美国记者斯诺迫切希望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经雪峰报告中央，得到同意后，派交通送往西安转入苏区。斯诺经过这次采访写成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

1936年8月到1937年9月的一年多时间中，雪峰担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的职务，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

生,全面抗战开始,他因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不满,与博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是他不久以后请假离开上海的原因之一。10月19日,他在上海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作了《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的讲演(收集时改题《鲁迅论》),又发表《鲁迅与民族统一战线》和《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在前两篇文章中,他用鲁迅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看法,批判了在抗日问题上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等等错误倾向,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民众解放”的必要性。

从1937年12月到1941年2月,雪峰在故乡度过了三年多时间,他一面创作有关长征的长篇小说,一面撰写《关于“艺术大众化”》、《论典型的创造》等论文。这些论文连同1937年10月所作的关于鲁迅的讲演稿,经邵荃麟编辑成书,题作《鲁迅论及其他》,1941年10月由桂林充实社出版。

在此期间,他还发动群众进行抗战工作,如组织抗日武装“同心会”,收购枪枝弹药,准备日军入境时进行游击活动;支持成立赤岸中学战时补习班,经常向青年学生作政治宣传;向家乡知识青年讲解军事知识,并培养他们实战的本领等等。为了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他书写“必胜亭”三字,勒石为匾,镶嵌于乡间通道的凉亭上。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到义乌,约请他负责创建“政工队”,他婉言拒绝。1939年下半年,他的党的组织关系由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恢复,任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写作关于长征的小说,是雪峰乡居中最主要的工作,他几易其稿,两更书名——原作《红进记》,后改题《卢代之死》,于1940年11月基本完成初稿,约五十万字。作品抒发了他对艰苦卓绝的长征,对英勇善战的红军,对壮志凌云的烈士的深厚感情。不

幸，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他的部分稿件被烧毁，部分存藏家乡，后来也散失了。建国后，他再度重写这部小说，又因种种原因未能问世。

1941年2月下旬，雪峰在家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囚于上饶集中营。在这个人间地狱中，他经受了苦役和疾病的折磨，但他把监牢当作战场，发动难友斗争，帮助同志脱逃。在狱中，他写了新诗几十首，以诗明志，并遥寄对党和战友的思念。这些在集中营所写、经过散落而幸存的诗篇39首，于1943年12月结集为《真实之歌》，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

1942年初，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得知他被囚的消息后，立即电请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营救。经过多方设法，于1942年11月由宦乡、郭静唐出面交涉，以治病为名保出。

离开集中营后，他暂住浙江丽水和小顺四个多月。在养病的同时，为《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审稿，撰写杂文。1943年6月，辗转到了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统战和文化工作。这时，除继续发表杂文外，还撰写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论文。

抗战胜利后，雪峰于1946年2月到上海。这一年，主要写作杂文和有关回忆鲁迅的文章，另外还根据三十年代旧稿改译了高尔基的小说《夏天》，此书是他最末一部译稿。他1943年至1946年期间写的杂文先后编为《乡风和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三个集子出版。

随着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日益尖锐，国统区言论极端不自由，雪峰从1946年12月起选用寓言这个文学武器来替代杂文，以记录时代的风貌。迄止上海解放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创作寓

言一百七十八篇，除在报刊上发表外，还先后结集为《今寓言》、《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出版。同时，又编述印度《百喻经》中寓言 98 则，题作《百喻经故事》刊行问世。

1949 年 5 月 25 日，雪峰以欢欣、激动的感情迎接自己的党和军队解放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在上海，1951 年春调至北京工作。曾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文艺创作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新地》月刊主编，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等职，并且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创作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建国以后，他写了很多杂文、论文，创作了电影《上饶集中营》的文学剧本，编印了《瞿秋白文集》、《可爱的中国》、《应修人潘漠华选集》等，主持出版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和当代青年作家的作品。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研究鲁迅、宣传鲁迅和负责鲁迅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

1950 年 10 月，雪峰接受党和政府的委派，担任设在上海的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1952 年 7 月，编刊社奉命移京，改组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仍由雪峰直接领导。

在他主持下，短短的几年里鲁迅著作编刊社和以后的鲁编室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大都表现在如下出版成果中，即：1951 年影印出版的 24 本《鲁迅日记》（1959 年又排印出版），1956 年 5 月至 1958 年 10 月出版的 10 卷《鲁迅全集》（注释本），

1956年9月至1959年8月出版的24种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同全集本），1958年4月至9月出版的10卷《鲁迅译文集》。另外还出版了一些回忆鲁迅的重要著作。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撰写《回忆鲁迅》、《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论〈野草〉》、《鲁迅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的梗概》、《鲁迅的文学道路》、《鲁迅和果戈理》等回忆录、专著、论文等三十多种。

由于“左”的思潮影响，雪峰在建国后的二十多年中，几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54年，他主编《文艺报》时，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被解除了该刊主编职务；1955年，卷入“胡风事件”中，在党内受过批判，也作过检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遭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这些灾难的降临，并没有使他悲观、消沉，他的心仍然向着我们的党。在开除他党籍的支部大会上，就表示了要求重新回到党内来的坚定信念。以后还屡次向组织提出这一要求，直到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愿望仍是要做党的队伍中的一名士兵。

在1957年以后的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他继续为党兢兢业业地工作。开头几年，一面担负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郁达夫文集》和《新文学三十年集·短篇小说选》。1961年11月，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后，他想继续完成建国初期即已重写的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于是将深藏在箱底的未完稿本取出来，端放在案头，正待动手，却被告知：象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伟大的革命题材，他不适宜写。这一次他不再将稿本锁回箱子里去，而是投入炉中，付之一炬。作为战士、作家的雪峰怎能抛开笔杆，自甘寂寞呢？他计划着创作关于太平天国的长篇小说《小天堂》，先是拟订了提纲，随即搜集了资料，

1963年5月至8月赴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跋山涉水进行考察，了解当地山川形势和太平军进军情况。他准备献上一生的经验体会，写出一部巨著。但只是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章节，1965年秋天又被派到河南安阳参加“四清”去了。

“四清”工作还没结束，十年浩劫开始了。他被召回北京，关进“牛棚”。他革命经历丰富，熟悉三十年代文艺界情况，引起当时有些人的注意，想从他那里挖材料，用来打倒文艺界一些首要人物，于是他成了各个外调机关争夺的对象，无休止地被强迫着写材料。前后大约写了一百万字，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也磨起了茧子。他对党负责，实事求是，不挟嫌捏造，不落井下石。粉碎“四人帮”后他写的一些材料已经发表，如《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关于1936年我到上海工作的任务以及我同文委和“临委”的关系》等已成为研究鲁迅、研究三十年代文学的重要材料。

1969年9月，出版社被“连锅端”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身处逆境中的雪峰，仍然无私无畏、刚正不阿，敢于挺身而出驳斥“四人帮”的谬论。当时，“四人帮”闹着要“挖”什么“三十年代的出版黑线”，于是把矛头指向三联书店，特别是生活书店和邹韬奋，“四人帮”的罪恶目的是针对周恩来的。1970年深秋某晚的群众大会上，雪峰激于义愤，立在飒飒的寒风中，不顾自己的处境，愤慨地批驳了攻击生活书店的谰言，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出版战线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1972年10月，他回到北京。自此直至逝世，除了断断续续地写作《小天堂》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鲁迅著作的整理和鲁迅研究上。他为鲁编室看稿、答疑，为各单位提供研究资料，还与孙用合作校订《鲁迅日记》，并筹划着要写一部新的关于鲁迅的比

较完整的书。凡是和雪峰有直接接触的同志，几乎都知道他耗费了大量心血来关注、培养后一辈的鲁迅研究工作者。他对待“新生力量”哪是什么“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他简直象一头牛，为了后辈，可以贡献出全部乳汁和血肉。五十年代，杜鹏程等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下成长起来；七十年代，他又竭尽全力来帮助年轻的鲁迅研究工作者。他热情地接待来访者，认真地审阅稿件，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答复来信，笔谈不便又约晤面，川资有困难还主动提出帮助，材料不足他东跑西走代觅代借……1975年3月他因肺癌施行手术，即便大病在身，仍不间断对后辈的培养。

1976年1月31日，雪峰走完了他革命的、战斗的、坎坷的生命途程，与世长辞，终年73岁。在逝世后三年，也即1979年4月，中共中央为他的“右派”问题作出改正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和政治名誉。1979年11月17日在北京隆重地举行了冯雪峰同志追悼会，党组织在悼词中对他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冯雪峰同志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对党的事业，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忘我。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作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在许多方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雪峰的生命虽然已经消逝，但他的革命精神和业绩却长存人间。洋洋百万言的三卷本《冯雪峰论文集》已于1981年6月出齐，收辑他全部文学著作的四卷本《雪峰文集》也从1981年5月起陆续出版。为纪念雪峰诞辰八十周年，1983年5月30日至6月2日，在浙江省义乌县举行了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

会，丁玲、汪静之、楼适夷、黄源、骆宾基、杜鹏程、王仰晨等 80 多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同志以崇敬的心情回顾了他的战斗经历，缅怀他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文学运动作出的贡献。卧病上海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在与丁玲通话时也表达了对雪峰的敬意，他说：“雪峰同志是我尊敬的朋友，是正直、热情的革命作家。他写过不少好作品，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1983.6.24 初稿

12.9 修订